

一年来克林顿政府的国内文化政策

刘永涛

美国克林顿政府执政一年来，面临国内存在着的一系列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克林顿本人除了致力于他在竞选时向美国公众许诺的解决美国经济问题之外，不得不拿出许多精力来对付日益严重的国内社会和文化问题，并提出种种措施和改革方案。本文着重对克林顿政府在过去一年里的国内文化政策作出分析。

一

每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文化问题是不同的。当今美国社会所面临的文化问题和矛盾，突出表现为与人性有关的一些问题，譬如同性恋问题、堕胎问题和早孕问题。对于克林顿政府来讲，90年代美国人所面临的这类问题，其复杂性和严重性已经远远超过了问题本身的范围，它们涉及到美国的政治、宗教、种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妇女地位等广泛领域，成为美国文化的焦点，引起社会舆论的长期争论和社会各界之间冲突。

美国的民主党素来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克林顿作为民主党成员当选为美国总统，夺回了该党丧失了12年的白宫宝座。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在美国重新抬头。克林顿政府首次试图通过政府行政干预，在美国文化领域建立起这样一种建制，让每一个美国公民都谨慎安全地对待性问题。这是克林顿“新文化政策”的核心。它的“新”在于这项政策的开明程

度。它把对待和处理这类问题的权力交给每一个美国公民。克林顿政府确立这项建制的理论根据是：每个人自身都具有自制力，有能力对人生或性倾向作出理性的选择。在政策制定者看来，无所谓有某种生活方式比另一种生活方式更道德的说法。

为了推行这一政策，克林顿政府不惜一切地采取一系列措施和手段。首先，作为三军总司令的克林顿，步入白宫不到一周，不顾美国各界保守人士和组织，尤其不顾美国武装力量中高级将领的猛烈抨击，匆匆宣布废止军中同性恋的禁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站出来为同性恋者说话的美国总统。其次，克林顿政府试图在美国全社会掀起一场普及性教育的群众运动，通过社会指导和教育，帮助美国人在生活方式问题上作出理性的选择。被克林顿提名为美国卫生局医务主任的乔伊斯琳·埃尔德斯博士建议，性教育应该从美国的幼儿园开始，建议把中小学校作为发放避孕套和传授避孕术的据点。显然是由于职业上的关系，建议者试图运用具有临床意义的手段去解决美国所面临的社会文化问题。美国的社会学家、教育学家以及传播媒体普遍认为，克林顿政府在美国开创了“对全民的性教育”的新时代。第三，克林顿政府试图恢复对美国堕胎咨询联邦基金拨款，表明政府愿意资助社会做好堕胎咨询工作，并且继续推行“选择自由法令”。在美国，几乎长达20年的堕胎与反堕胎之争已经激化成国内政治、道德

和宗教上的大论战，甚至发展到用武力来解决问题。1993年3月10日，一名专做堕胎手术的美国医生在佛罗里达州的诊所外被人开枪打死，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起因抗议和反对堕胎而导致杀害医生的案件，在美国社会激起强烈反响。克林顿一方面呼吁不允许使用暴力去限制美国妇女的权利，另一方面加紧争取在国会通过两项自由堕胎的议案。克林顿政府还试图在医疗保健改革中建立堕胎保险，把堕胎的权力交给美国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做出合理的选择。这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克林顿政府对当前这一最为敏感问题的基本态度和看法。

二

克林顿政府在美国文化领域进行这番激进的改革，一方面是为了补救美国社会每况愈下的道德行为和文化价值，另一方面也有出于民主党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争取赢得美国党内以及社会上具有各种倾向的政治势力，尤其赢得美国年轻一代和作为民主党传统支持者的各种自由派社会团体对白宫的支持。此外，它还与决策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和政策构思者的社会经历有关。

克林顿本人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美国政治人物。他的青年时代正处于美国社会文化发生剧烈变革时期。他亲身经历和参与过美国校园的反越战运动，目睹了美国60年代和70年的女权主义运动、嬉皮士行为，以及主要由于避孕药的发明而掀起的所谓性解放运动。他熟悉战后美国的爵士摇滚音乐。1993年10月，克林顿总统在一次白宫草坪为美国文化名人颁奖的仪式上，回忆了黑人爵士艺术家雷·查尔斯的音乐如何对他的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吹萨克斯管，打垒球，特别喜欢读

美国畅销小说。在美国总统中，克林顿的文化经历是独特的。一个人的青年时代是其形成一定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认识的关键时期。克林顿的“关键时期”是在受战后美国开放文化的强烈影响和熏陶下度过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克林顿步入白宫后关注美国文化现状问题、有意调整美国文化政策，其激进程度是他的前任，那些出生于大战前的美国领袖布什、里根或卡特所不能相及的。

为了调整美国的文化政策，克林顿颇用心计地挑选和安插了几位对美国文化抱激进观点者进入政府行政班子。它反映出克林顿本人对当今美国社会中一些争论不休的重大文化问题所持的态度。这实际上是他身上文化积淀在发生作用的结果。首先，克林顿刚入白宫不久，便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接待了一批同性恋激进分子，支持他们游行，并任命他们中间的一名负责人，旧金山市监督官罗伯塔·阿赫顿伯格为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副部长，算是对当初同性恋组织和个人集资350万美元支持他竞选总统的一次回报。此事得到国会参议院的批准，从而开创了美国历史上同性恋者担任联邦政府部门高级职务的先河，它也意味着在美国90年代，同性恋文化开始被社会政治所接受和认可。其次，克林顿提名现年59岁的阿肯色州的公共卫生署主任，儿科专家乔伊斯琳·埃尔德斯博士为全美卫生局医务主任。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位乔伊斯琳·埃尔德斯女士一直致力于通过普及性教育、加强避孕措施和提倡堕胎自由等途径去帮助阿肯色州的人减低早孕和艾滋病的发病率。克林顿政府班子里体现激进文化观点的核心人物是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唐娜·莎拉拉女士。这位擅长跨文化研究的前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曾在卡特政府时期出任过负责住房问题的官员。她支持堕胎运动。早在

1992年，就四处游说，力劝五角大楼解除军队同性恋的禁令。她还是一个非常关注儿童问题的人。约在两年前，莎拉拉在芝加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预测，在未来的社会里，双职工家庭、单身家庭、同性恋家庭的现象会越来越普遍。1992年12月18日，当她将出任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的消息传出之后，美国的同性恋者和艾滋病患者为之欢呼。另外还有一名激进人物，那就是被克林顿提名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鲁恩·巴德·金斯堡。此人是1977年出版的《美国法典中的性歧视》一书的作者。她的政治主张是，妇女堕胎应该合法化，美国妇女在社会中的传统角色应该得到改变。

从上述情况来看，美国文化领域里这场激进改革的出台，明显地具有以下几点特征：第一，它明显带有政治交易的目的，想重新在美国公众社会展示民主党所谓开明自由的传统形象，为美国总统的中期选举拉选票；第二，它与决策者克林顿本人的文化特质有密切关系；第三，克林顿用心良苦，在联邦政府中的公共事业部门、卫生部门、医疗部门以及法律部门安插一批“女才子”，为实施文化改革作组织上的准备。

三

自50年代起，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知识界，一直就美国国力的兴衰问题不断展开激烈的争论。直至80年代末的一次大论战中，衡量美国国力兴衰的传统尺度仍是美国经济的发展状况。然而，进入90年代，许多美国人包括知识界人士开始感到，当前美国所面临的日益严重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它将最终导致美国社会的解体，从根本上削弱美国的国力。美国文化是不是正在衰落？越

来越多美国人的回答是肯定的。美国前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在1993年3月15日为《华尔街日报》撰文，通过几个主要文化指标指数的变化，说明美国文化正在衰落。还有其他官员和学者著书撰文，感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的日益没落，在此不一一例举。

一般来讲，国家经济的繁荣和萧条是呈周期性的。萧条过后必有复苏。然而，文化的变迁并不具有这种周期性。文化的进步或颓败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在当前美国所面临的同性恋、堕胎、早孕等严重问题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所谓美国人的文化价值观、人生观以及道德行为标准，是战后美国文化经历了几十年呈阶段性的动荡变迁而形成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克林顿政府似乎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它所能做的只是—方面既要维护美国的自由民主精神，把对性倾向的选择看作是美国公民应该拥有的一种法律权利和文化权利，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提供帮助和咨询，教导美国公民选择一种安全谨慎的生活方式，从而避免不良社会后果和阻止艾滋病的蔓延。

克林顿政府的国内文化政策将会给美国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美国各界保守派团体和个人，尤其是美国共和党人士的答复是消极的，而且是抱着狭隘的派系式的抵触情绪，在此且不去论它。下面只想客观地借用两段历史来估计克林顿文化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第一段历史：自1776年起，美国人一直奉行所谓政治生活上的民主和自由。到了本世纪60年代，民主和自由的权利开始朝美国的社会文化生活方面扩展，引起美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女权运动和黑人民权运动，同时也带来一系列反传统文化的后果，譬如高离婚率、性解放、思想颓废。第二段历史：根据有关统

(下转第64页)

独自平安回家。娜佳疲惫地回到了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那套房间中她自己的卧室。根据她女儿后来的陈述，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她已自杀身亡。子弹是从一支小号的左轮枪里射出的，这支手枪是她在柏林任职的兄弟帕维尔·阿利卢耶夫作为礼物赠送给她的。她当时任苏联驻德国贸易使团的军代表。她身后留下了一封充满她个人在政治上对斯大林强烈谴责的信。帕维尔·阿利卢耶夫被她自杀的噩耗震惊得目瞪口呆，几乎失去了知觉。她在信中所指责斯大林的话使他愤怒得最后采取背叛行为。

在30年代的布尔什维克的圈子里流行着

关于娜佳之死的另一种不同说法。据说，在那天宴会回到家里之后他们发生了争吵，斯大林在盛怒之下开枪打死了她，并用手扼死了她。正如一位接近上层领导的人士告诉笔者的，斯大林在娜佳死后第二天与政治局成员们会面时说，当她威胁地向他冲来时，他采取了行动。我们不妨假设这也有可能，那天晚上当斯大林回到家里时她正准备自杀，而她拿着手枪袭击他时，就在这种暴力情景下，斯大林扼死了她。

（摘译自 [美] 罗伯特·C·塔克尔的《斯大林执政：自上而下的革命，1928—1941年》一书）

（上接第51页）

计，1979年至1987年阿肯色州的早孕数字从11110例下降到8798例，但是，从1988年开始，当时任阿肯色州卫生署主任的乔伊斯琳·埃尔德斯在该州推行她的扩大发放避孕套计划，早孕数字开始急剧回升。1990年达9432例。这两段历史表明，美国社会追求自由的权利，反过来，正是自由的权利给美国社会带来许多严重不良后果。人对自由的欲望是永远不会有满足之日的。颇有趣的是，正是充分自由的本身会造成对自由的约束。艾滋病在美国就是一例。它是美国社会宣扬性爱充分自由的产物，反过来，它又会约束美国人的性爱自由。因此，美国社会自由制度的问题，乃是克林顿政府需要认真考虑的。其次，人具有社会属性的理性选择能力，也具有生物属性的非理性选择能力。在生活方式、性倾向、婚姻、家庭等这类更多地受

到情感支配的社会文化行为中，非理性选择能力会有更多的表现机会。人往往更愿意从后果和痛苦教训中学习道理。这一点也是克林顿政府应该考虑到的。

因此，克林顿政府的国内文化政策，可能会对美国社会带来两种后果。一种后果是，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和社会措施，控制艾滋病在美国的蔓延，这是克林顿政府所希望看到的。另一种后果是，对同性恋问题、堕胎问题以及对性教育的普及问题所抱的更为开明自由的态度，会引起美国文化社会更严重的问题和灾难，引起美国各社会团体组织或党派以及个人之间更大的争论和冲突，加速美国文化的衰落。后果到底如何，人们将拭目以待。

（1994年1月25日完稿）